尊重科学的风范，一种呕心沥血、无私奉献的境界。我认为，这是先生留下的丰厚遗产，需要我们倍加珍惜，努力加以研究、实践和传承。

日前，经过数年努力，《故宫保护总体规划》已由北京市人民政府正式公布。我想，这也是对长期以来为故宫保护倾注大量心力，与故宫结下不解之缘的郑孝燮先生最好的纪念。我们以此表达“故宫人”深深的敬意和思念。

（转自《人民日报·海外版》2017 年 2 月 18 日）

为李曦沐送行

○马识途（1945 中文）

我的好友李曦沐走了，对我来说有如惊天霹雳，真的，不是夸张，我真像头顶响一声炸雷。 他的女儿皎皎从北京打电话给我的女儿万梅，转告这个噩耗：“爸爸走了！”我听闻后不觉惊问：“什么？李晓（我们一直沿用他在西南联大的名字称呼他）走了，这怎么可能呢？”就在得知这个消息的前两天， 我和他还在电话中交谈了很久，有说有笑。更几天前，我女儿将他从微信中传来的照片拿给我看，他精神饱满，毫无病容（这照片现在还保留在我的平板电脑上），怎么忽然就宣告说他走了？这真是应了古话“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旦夕祸福”呀。

2014 年 5 月，李曦沐（左）在中国现代文学馆出席马识途书法展时留影。右为联大校友张彦

上世纪 40 年代，我在昆明西南联大结识的最熟悉的二三十个好友也是战友，除有几个在解放前夕牺牲外，近十年来，陆续在离我而去，我这个当时比他们都长近十岁的老家伙却依然健在，一次又一次地接到恶讯或讣文，一次又一次地为他们而悲怆不已。2015 年我满 100 岁的生日时，我写了一首《怀远》的诗：“年逾百岁意迷茫，绕膝子孙奉寿觞。蜡烛滴红怀故友，金杯未尽泪满腔。同舟每忆波澜起，夙夕常思风雨狂。每读讣文肝欲裂，几人再聚话炎凉。”蜡烛滴红，如烈士鲜血；金杯溢酒，如悼亡之泪，真是感慨万千。

去年底，我把这首诗所在的诗词集也寄给了李曦沐，他收到后打来电话，一来向我祝贺新年，二来感谢我寄给他的这本新出版 的《诗词集》。他说他读了我那首《怀远》 诗，回忆起当年我们那些战斗岁月，为战友们大半凋零不胜唏嘘。他很关心我的健康， 我告诉他我还行，还正在爬格子

呢，除了去年完成了《人物印象》一书外，现在正在写《夜谭续记》。他听后不胜惊叹，说："一个百零三岁的老人，还坚持创作，不断地出版新著，老马，你真行啊！"他与我通话的声音还在我耳畔回响，很有底气，想来他应该是健康的。他是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的常务副会长兼总干事，一直在忙西南联大校友会的事，我从寄来的《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简讯》60 期中，还看到他的"工作情况报告"，知道他正在参加西南联大 80 周年纪念会筹备工作，怎么他忽然就走了呢？ 曦沐和我有七十几年的深厚友谊，那一桩桩一件件往事并不如烟，常浮现在我的眼前。

我们初次相见是 1941 年的秋天，我们同时考入西南联大，曾长期同住一间宿舍。1941 年 12 月，我和他同时莫名其妙地卷进一个本不该发生的学生"讨孔运动"。我们两个在那时相交相知，并成为有共同进步理想的青年。他那时不是共产党员，却有加入共产党的强烈愿望。那时，正是政治革命低潮时期，国民党特务疯狂地捕杀共产党员，有些党员或由组织安排隐蔽，或自动脱党，像曦沐那样在那种恶劣形势下偏要求入党的人是不多的。我认为他在我作为联大地下党支部书记从事学生进步活动时，帮助我在学生中做了很好的工作，是够条件加入共产党的。因此，1943 年初夏，我带他在一个校外的坟场里，对他作了正式的入党谈话，准备向上级请示后举行入党仪式，吸收他入党。但是当我向党的云南省工委请示时，才知道那时党的南方局已决定在国统区暂停发展新党员。可我对他已进行了入党谈话，该怎么办呢？经过请示，省工委领导对我说，叫他为"党外布尔什维克"吧。"党外布尔什维克"，这样一个奇怪的从权办法，曦沐接受了，且更加努力地工作。1945 年，终于在允许发展党员的决定传来后，我第一批就发展他加入了共产党，那已是 1945 年 9 月的事了。

1945 年我奉命到滇南作工委书记，准备在那一带发动农民游击战争，配合解放大军解放云南。曦沐就和齐亮、许师谦等党员，随我一起到了滇南。曦沐自愿到一个僻远乡村小学去当教员，在那里发动农民，准备武装斗争，不久他就在一个乡掌握政权和武装队伍。他正干得起劲，却因

2014 年 6 月，在近春园举行的马识途老学长百岁生日宴会上，李曦沐讲述他和老友马识途在联大的往事。右起：李曦沐、邱勇、沈克琦、潘际銮、马识途、马万梅、郭樑、王丽梅

为我党进军东北，很需要干部，他是东北人，于是奉命调往东北工作。其后，他在教育部门及党的黑龙江省委和东北局办公厅先后担负领导工作。他是一个很好的笔杆子，也正如他后来对我说的，当然地和大家一起犯了不少并不了解的错误，“文革”一来，当然免不了和主要领导人一起遭受莫须有的罪状和批判。后来几经折腾，也一起被“解放”，又走上了工作岗位。

1974 年，被“解放”后担任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的我，为电影的事出差到长春，回来时路过沈阳，便到曦沐家去看望他。曦沐向我谈到辽宁许多“文革”中的怪事：把干部全部赶到农村去永远落户，弄得乱七八糟，生产困难比关内还大些，传出所谓“陈三两”，居民每月每人只供应三两油，粮食尤其是大米白面更是十分紧张。

但是我在他家住的头两天，他们天天给我在客房里开单份，吃的都是白米饭，我感到很奇怪。第三天我吃罢饭无意走到厨房，看他们一家正在厨房里吃饭，大人小孩吃的全是红色高粱米。我尝了一口，高粱米饭很粗糙，实在不好吃。我吃惊地问曦沐这是怎么回事？他才告诉我说，沈阳全市居民每月的配给绝大部分是粗粮（高粱米玉米面），细粮（大米白面）很少，也就几斤而已。我这才知道，曦沐把他们全家当月配给的大米全数拿来给我一人吃。我大为惭愧，同时也生气，责备他说：“家中的大米你不给小孩子吃，都拿来给我吃，还不让我知道，你咋能这样对待我这个老朋友呢？”曦沐用话搪塞：“你们四川是吃大米的，怕你吃不来高粱米。”我还生气：“李晓，你这样待我，太不应该，我们是什么关系？是生死之交呀！”他只得认错，允许我和他们一起吃高粱米。奇怪，我和他们一家人一起吃饭，同甘共苦，竟然不再感觉到高粱米难吃，而是津津有味了。

1980 年，曦沐被调到北京，先是在建设部工作，后来又到国家测绘局任局长，我们见面的机会就多一些了。我每次到北京，几乎最先去会面的就是曦沐。

1980 年秋，我到中央党校高研班学习，这个高研班，学员都是省级干部，又基本上都是才被“解放”不久的。大家虽然都有怨气，可是争论最多的是关于社会主义问题。我把研讨班的情况对曦沐说了，他说他也正在思考，到底什么是社会主义？我们实行的是什么社会主义？

我们在一起讨论很多，也有争论，但有一个共识，就是我们过去实行的和现在正在探讨实行的，恐怕都不是马克思所说的作为共产主义前过渡阶段的那个社会主义，我们称之为完全的社会主义。但是我们现在只能也必须有适合于中国当前情况的社会主义，一种特殊的社会主义，即向完全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前进的社会主义。曦沐提出是前社会主义，即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。这和后来邓小平提出的我们仍处于“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”的说法，竟然是不谋而合。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就是中国社会主义的中国特色。曦沐有这样的思考，我也很是赞同。

曦沐已经走了，他的敏锐的思考，却令我不忘，我们现在来追思曦沐，无妨将他的思考说出来就教于老朋友。

曦沐已经走了，他不是一个什么有名人物，但是他的为人，他的品性，他的关心中国之命运的思考，是我永远不能忘记的。

2017 年 2 月 12 日